

March 2022

Disputes over the Concept of “Literary Study” in Pre-tertiary Education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Min Li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Li, Min. 2022. "Disputes over the Concept of “Literary Study” in Pre-tertiary Education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42, (1): pp.91-100.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42/iss1/10>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民国初年初等学校教育的“文学”纠葛

李 敏

摘要: 民初新式学校教育延续清末以日为师的整体趋势,“文学”观念受知识资源与教育理念等因素影响,呈现复杂的纠葛状态。小、中、师范等初等学校,定位于普通国民教育,不同人对“文学”的意涵、性质及取舍态度,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新学制虽确定小学以上国文科以“涵养文学之兴趣”为要旨,但在实际教学中,在国文科与“文学”发生关联的同时,也有人质疑国民教育中“文学”的适用性。受西学影响而出现的《中国文学史》,在编撰体例、材料取舍上引发了极大的争议。这些问题正是19世纪以来,“文学”概念受不同知识资源影响,随时代而变化的特点在教科中的表现,影响着教育与学科的发展。

关键词: 壬子学制; 初等教育; 国文科; 文学; 《中国文学史》

作者简介: 李敏,历史学博士,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史研究。通讯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南二环东路20号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050024。电子邮箱:hislim@qq.com。本文系河北省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清末民初莲池学人与‘文学’观念之构造”[项目编号:HB19LS011]阶段性成果。

Title: Disputes over the Concept of “Literary Study” in Pre-tertiary Education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bstract: The new-style schooling system in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continued to learn from Japa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but various sources of influence from intellectual background and educational ideologies resulted in the complicated concept of literary study (*wenxue*). Although the pre-tertiary education, which comprised of primary school, junior high school and teacher training school, focused on the general education of the common people,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cept “literary study” was varied in terms of its connotation, nature and criteria for inclusion. The new educational system designated that the Chinese subject for pre-tertiary schools should aim at “cultivating interest in literary study (*wenxue*),” but there were doubts about the pragmatic feasibility of literary study in national education when it was to be related with the study of the language. Hence a coursebook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primarily informed by Western learning, was developed but its method of compilation and selection of materials prompted great controversies. The issue behind the phenomenon involves the conceptualization of literary study as an educational discipline and how the study transforms over time in the context of new introduction of different intellectual resources since the 19th century.

Key words: Ancient Chinese Renzi educational system; pre-tertiary education; Chinese language as a school subject; literary study;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Author: Li Min, Ph. D.,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at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academic thought. Address: No. 20 South Second Ring East Road, Shijiazhuang, Hebei, 050024. Email: hislim@qq.com This article is supported by the Youth Project of Social Science Fund of Hebei Province (HB19LS011).

现代学术分科体系的建立,是中国学术发展的一大关纽。中国古代学术的发展自有源流脉络,文苑传、文集、诗文评构成文章之学的自有体系,古代典籍中的“文学”并非专有名词,甚至并非名词。以词的观念检索古籍可以看到,“文学”二字大多时候可作文、学分解,近于文教、学术之义,具体含义随时代而变化,虽有指文辞的用法,但并非约定俗成。正由于这种特点,在19世纪的中西交往中,“文学”逐渐被用来对译“education”“literature”等不同的西文词汇。而在19世纪的西方语境中,“literature”处于变化中,复因中西传通中的因时改造与误解背离,与之对应的“文学”概念随语境而变化。甲午以后日本的影响逐渐突显,在中、西、日多元知识资源交融下,“文学”含义变动不定,只能在具体情境中辨析。

近代“文学”观念与学科的演变,受到学校教育、报刊出版等媒介载体的直接推动。进入民国后,学校教育在延续清末以日为师总体方向的同时,教育宗旨因应时代变局进行调整。小、中、师范等初等学校定位于普通国民教育,有别于大学为研究高深专门学问而设,对学科观念在社会的流通具有重要意义。前人对近代“文学”概念^①的研究侧重词义辨析,对学科观念演变与历史的关联似着墨不多。^②本文试图回到民初教育变革的历史现场,探讨1917年文学革命主张流布开来之前,在不同知识资源、教育理念影响下,初等学校教育中“文学”观念的复杂形态,以期深化对近代教育与“文学”学科观念建构之关系的认识。

一、新学制创立过程中的“文学”歧见

民国建立后,前清遗留的学制已不适应共和时代,新学制的制定势在必行。在学制酝酿出台过程中,不同教育理念者对初等学校教育与“文学”关系的认识各异。学制方案在照搬日本的同时,还与当局教育方针息息相关。新学制中的“文学”观念,受到西学观念、人事、教育理念的多重影响。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被任命为教育部总长的蔡元培,因曾在商务印书馆任职,与该馆诸人多次商讨教育方针,商务印书馆深度介入新学制的制定。据蒋维乔回忆,蔡元培于1912年1月8日造访,谈及对各级教育的看法,特别提到“以美育

代替宗教”(蒋维乔,《从南京教育部说到北京教育部》1)。陆费逵等人则在报刊发表议论,冀以往日投身教育的经验及自身理念,影响教育改革。陆费逵在《敬告民国教育总长》一文中,提出速宣布教育方针、颁布普通学校暂行简章等四项建议(吕达 101)。在他列出的中、小学校及初级师范课程办法中,初、高等小学国文科以习字、作文为主,中学校、师范学校国文科第四学年增加“文学史”一项(112—116)。蒋维乔、高梦旦、陆费逵等人还参与教育法令的起草。《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对初等小学、中学、师范学校的课程科目、时数作出了规定,改变了清末各地学堂“国文”“中国文字”“中国文学”混用的状况,一律设“国文科”(《教育部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及课程标准(呈正副总统咨各省都督)》5—8;《教育部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及课程标准(续第四期)》10—12)。

各级学校国文科的课程设置,虽与清末大同小异,但其背后支撑的教育理念却根本不同。1912年2月8日,蔡元培发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定教育方针为军国民主义、实利主义、德育主义、世界观、美育主义。此五大主义分配于各教科,而所占比例视其性质而异,“国语国文之形式,其依准文法者属于实利,而依准美词学者,属于美感”(蔡元培 15)。蔡元培的理念与商务印书馆诸人较为相契,但各自的侧重却不同。陆费逵对其偏重美育、世界观颇持异议,认为教育宗旨应“以养成‘人’为第一义”,其首要在培养谋生之技能,“欲达此目的,非采实利主义为方针不可”(吕达 119)。世界观、美感为养成“文学家”及高深学问所专有,不适用于普通国民教育(119)。教育部北迁后,发布一系列教育部令,教育宗旨以蔡元培的理念为基调,“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璩鑫圭 唐良炎 651)。初、高等小学校国文科,注重简单普通文字之练习,未标示与“文学”的关系(691)。中学校、师范学校国文要旨,除通解普通语言文字、能自由发表思想外,“并使略解高深文字,涵养文学之兴趣,兼以启发智德”(669)。从小学与中学、师范的差别来看,接受了“文学”为较高深专门学问的理念。

将新学制方案与日本明治三十三、三十四年间(1900—1901年)发布的各级学校规则相比较,

可以看出,前者几乎照抄后者。如,明治三十四年(1901年)《中学校令施行规则》:“国语汉文要旨,在使生徒能了解普通言语文章,正确自由表彰其思想,兼养其文学趣味,以资智德之启发。”(黑田茂次郎 土馆长言)日本自明治五年(1872年)颁布学制后,各级学校规则几经修订,国民教育理念早已成为社会通识。民初新学制中学校、师范学校国文科中的“文学”“文学史”等名词,即来自日本。而小学校国文科之所以未强调“文学”,亦本之于日本学制,只是在移植到中国时,被赋予新的教育理念。

新学制注重美育、“文学”,但社会舆论对此却有不同意见。寄鸥认为,中国衰弱的原由在于过度重视文字,而文字只是教育的媒介,不能代表教育全体。“如雅典之诗歌,虽合于审美的教育,而以偏于文事之故,国势上受其影响,遂有斯巴达武力侵入之结果”,因而“文学家”不足以称为“教育家”(寄鸥 5)。当日亟需的是“教育家”,而非“文学家”。所说“文学”以文字为载体,具有审美的特质,诗歌是其一部分。对于轻视美育的观点,余箴的看法相反。他认为一般人把“专门意义”的美育与“普通意义”的美育混为一谈,以为美育仅为“造就文学家,若艺术家之准备,故不宜于一般教育”(余箴 72)。事实上,真正的文学家、艺术家有专任美育的学校。而普通教育上的美育,目的在于使人的感情获得完全发展,并非欲养成“文学家”“艺术家”。主张以小学校国文,培养国民的审美趣味,“使他日者真正之文学,若艺术,藉是以得孕育之地”,以鼓动国民元气,铸社会品性(78)。

这些观点都将“文学”与审美、艺术相联系,是当时西学影响下较普遍的看法。但近代中日汉语文化圈内的“文学”概念,远未统一,^③民国初年教育议论中的“文学”亦具有多样性。1913年,驻日常任调查员袁希洛报告《日本各种教育之系统》,分为文学教育、工业及理科、法律经济政治、农林蚕桑水产兽医、商业等不同类别的学校系统(袁希洛 1—10)。所谓“文学教育”指文科,与理、法、商、医等科目并列,含义较审美、艺术更为宽泛。

教育部所定学制虽已颁布,但民间舆论在不同教育理念下,对初等学校中“文学”的含义、性质、功能的认识及取舍态度,并未达成一致。杨昌

济自欧洲回国后,具有世界眼光,对国粹与欧化采调和态度,主张注重国文、国学。他认为“文学”的作用,并不仅限于“读书识字,作为文章”等与人交往方面,更在于对精神修养的作用,“如此之影响,得之于本国文学也易,得之于外国文学也难”。以莎士比亚戏曲对英美的影响为例,他指出:“一国之文学,乃一民族精神之表现[……]欲陶冶青年之心性,不可不有赖于本国之文学。”当时学校有重“实科”而轻“文学”、重外国语而轻国文的倾向(杨昌济 54)。“文学”与“科学”对举,国文、国学、戏曲包含其中。

虽同样强调“文学”的重要,但各自含义、性质却有差别。啬厂认为,中国教育固有特色及今后教育要点在于道德与文学。“文学所以和人情性,使之悦乐,博其兴趣,而发其美感,亦改造精神之要术也。文明国之教育,蔑不重文学者,故诗歌、小说列于诵习。”(啬厂 3)范源廉辞去教育总长后,担任中华书局编辑长。他认为当日中国处于过渡时代,“中国为文学之国,凡欲为过渡时代之渡船者,不可不自文学方面转移国人之思想”(《约翰大学毕业式志盛》10)。国文科“以教授文字为主旨,文字者国民精神之所寄,而个人理想之所由著者也。其教材之内容,常足以使生徒发生文学之兴趣,及资以启发智德或兴起其美感”(范源廉 2—3),肯定国文科对“文学”“美感”的积极意义。

在国民精神改造的共同旨趣下,另一种观点则将“文学”看成专门高深之业,认为不适用于国民教育。张直生指出,山西小学教育弊病在于“不明小学教育之本旨”,“小学教育非养成官吏仕进之阶梯,亦非养成理学家或文学家也,且并非养成豪杰也,在养成一般普通之国民而已”(张直生 3)。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后,中国民气沸腾,国民教育更受重视。凤兮认为今后教育,首须排除国民教育之障碍,“国民教育不可以文学为唯一目的”。一国文字固然为其文化之代表,但国家设学目的,在于培养大多数健全国民,“非必举国民全体皆为精深之文学家”。小学校应教普通应用文字,“至高深之文字,如近人所主张之词章学、经史学,则应让之于专门研究者”(凤兮 2)。将“文学”视为高深学问,以文字为基础的词章学、经史学都包含其中,并不仅限于文辞。王朝阳认为,文学有卑劣、高贵之别。“超自然之文学”

能“解去人心之桎梏,开拓灵界之自由”;“国民文学”则“讴歌民族之特性,表扬立国之精神”,二者能导人类于进化。而“卑劣文学”则使人精神软化,志行堕落。“文学”高卑之辨,以思想为衡断,而不当以文词分别。“故无论为诗歌,为小说,为剧本,善用之皆为救济人心之良药。”(王朝阳 1、2)他所说“文学”,即指以文字为载体的诗歌、小说、剧本等艺术形式。虽同样视“文学”为高等学问,但意涵范畴有所差别。

由此看来,新学制虽接受日本西学经验,“文学”成为独立的学科名词,但其内涵外延并不固定,这是长期以来“文学”概念变动不定的结果。朝野舆论中,不同的教育理念并存,对“文学”的性质的认识及取舍态度也截然不同。学制制定过程中的分歧,意味着实际教学中也难以达成共识。

二、国文科与“文学”的关系

正如各级学校课程标准所定,各教学科目中,国文科与“文学”关系最为密切。中学、师范学校课程标准虽规定“涵养文学之兴趣”为国文要旨之一,但在实际教学中,国文科与“文学”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在统一的学制方案下,国文与“文学”的联结显得理所当然,但同时也有人质疑“文学”的适用性。

民国建立后,官方教育理念虽发生了变化,但各地实际授学对清末旧办法有所继承。清末以来,初等学校国文科多以教授文字辞章为目的,在一些官方或民间表述中“国文”与“中国文学”等同,所编国文教材或讲义即径以“文学”为名。清末直隶第一师范学堂教员张佐汉,曾奉学部令编定《文学教授细目》。所说“文学”专指文辞,教授法中西兼采,主张“文学教材以《古文渊鉴》为主,而兼采子史各集之平易雅训者”,其体裁则损益《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钞》,分为纪载体、告语体、著述体三种;以《说文通训定声》《经传释词》《名学》《文通》《文典》等为“文学参考书”;取姚鼐所阐神、理、气、味、格、律、声、色中的后四字,作为初等师范生习文之标的(张佐汉 31—34)。1913年,《直隶教育界》重刊此文,欲将此办法沿用到课堂中。

在“文学”等同文辞的意义下,如何将中国旧有的文章学资源接入新式课堂成为问题。教员为

应对国文教学,编辑各种教科用书,既受到学制规约,又融入个人学术理念。南社社员顾平之自称担任学校讲席十余年,“中国文学之书,汗牛充栋”,难于取择。而晚近文章选本,如姚鼐、曾国藩诸家所编,“于统系不甚注意,且非教科体裁”。欲编辑国文讲义,借鉴中国旧有的选本体裁,“以文学史之性质甄择之”,期于文章之源流派别有所得(《顾平之编述国文讲义宣言》6)。1913年秋,姚锡钧受聘为浦东中学国文教员,其间作《文学论厄言》一文,评述唐迄清文章派别得失,为后辈学文指示门径,认为“真知唐宋者,必不薄六朝;真能古文者,必不鄙骈丽”(姚鹇雏 645),试图调和古文与骈文之争。任教于松江中学校的雷城,创办《文艺杂志》,“以商榷文艺,网罗典籍,保存国粹为宗旨”(《编辑大意》2),同时选清代名家之文,辑为《新编国文读本》。他认为生徒学文当先从事于清代名家之文,学有所得再返观唐宋八家、秦汉诸子,“苟读是编,而不出以轻心怠心也,则文学一途”,可升堂入室(雷城)。雷城还选录论说文字,编辑《初等学校论说新编初集》《高等学校论说新编二集》《中学校论说新编三集》,供各小学、中学之用(《各校应用之书》第4版)。

为应对共和时代的教科需要,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出版机构,竞相编辑教科用书。出版既是生意,又促进文化的更新嬗代。商务印书馆编辑小学教科书,“以养成共和国民之人格”为宗旨,注重图画、文学的审美性质,称:“书中附图书及五彩图,便与文学相引证,并以引起学生兴趣,而启发其审美之观念。”(《民国纪元商务印书馆发行所落成纪念 新编共和国教科书五折收价》第2版)在各科教科书中,国语、国文类与“文学”的关系最为密切。林万里等编《订正国语教科书》广告称:“全编大致由浅入深,虽异文言,却非俚语。且足引起儿童兴会,由此进步足为研求文学之阶梯。”(《商务印书馆出版图书》4)蒋维乔编辑《教授法讲义》阐发各科教授要义,强调:“国文之材料新鲜,趣味丰富,则读者不知不觉,自能养成文学上之趣味。”(蒋维乔,《教授法讲义》34)国语、国文课程注意语言文字的练习,为研求“文学”必经之路。国体更革后,陆费逵抓住时代机遇,联合同仁脱离商务印书馆,创立中华书局,即起意于编辑教科书。所编高等小学国文教科书“以养成中华共和国高等国民为宗旨”,

“于普通各种文体,大略均备。多选名人文字,以助文学之进步”(吕达 96)。这些编纂者对“文学”的追求,与教育部所定课程标准相一致。

作为学校教科的主干科目,国文科教授方法改良被广泛讨论。苏州景海女学毕业生华慧纬认为,游历能增长见识,有益于作文。若仅靠批阅、诵读旧籍,难以适应世事变迁,“迂谬少当,不足以言文学”。司马迁、杜甫因在诗、文上的成就,最终为“吾国文学家之鼻祖,而所以补益其文学者,无一不从游历来”(华慧纬 9)。针对有人认为“文学”无用,文字不必深究的观点,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国文教员沈昌直指出,当日文字衰落已极,中等以上学校之毕业生出而任事,于文字之应用左右支绌。从选文、改文、练习应用文字等方面提出改良办法,尤其强调诵读的必要性(沈昌直 1—7)。当时“文学”面临的价值危机,与实用科学的冲击密切相关。1915年,倪羲抱在上海创立国学昌明社,并向社会征文讨论国文教授法改良。泰县启明高等小学校教员丁年甲认为,国文堕落肇因于过分强调实用。“欲图文学之进步”,当先预知国文之重要、近日国文不振之状况及学校国文教授之缺点(丁年甲 1)。从教授、选文、改文三方面谋求补救之法,最根本在于“教者宜将文学之功用,恺切晓谕”,以养成学者坚忍笃信之心(8)。这些论述都将“文学”等同于文辞,认为是中小学校国文所亟需。

祁焄焕同样强调中等教育“文学”的重要性,但对“文学”所指却大为不同。他认为“文学者,五千载相传之典籍,经、史、子、集皆属之”,不可漠然处之。将“文学”与“科学”对举,近似于国学。同时又将国文与“文学”等同,认为中学国文之目的虽在于造就“科学”基础,而非辞章士,但以半通之文必不能吸取“科学”之精粹。提倡自动的教授法,以教者为之讲解,学者能自读、自看、自作为目标(祁焄焕 35—36)。他所说“文学”既与“科学”对举,指涵括经、史、子、集在内的国学,又用来专指文辞,含义具有多样性。

在国文教学讨论中,另一些论者从不同理念出发,对国文科与“文学”的关系持否定态度。近代教育的发展趋重实用之学,科学获得至高地位,中国文字有废弃之虞。1914年,东吴大学学生组织同门会,主张保守国粹。针对有人认为中国文字不能准确表达“科学之的义”,竞习他国文字的

现象,潘襄成认为应一面改良国文教授法,一面明定科学名词。学校国文科,应教授有裨于推阐各种学理之文字。至于“美的文学”,“如晋唐以来之乐府俚文、古风近体,以迄宋之诗余、元之词余等,蔚成文学界大观”,当列诸专门科,以存国粹(潘襄成 20)。如何将小、中学校国文教学与“科学”接轨,受到普遍关注。《中华教育界》专对此征文讨论。江苏省立第七中学校长缪文功认为,中小学校国文病根“在于无系统,尤在于不合教育的,而徒为文学的”(缪文功 1)。“近出教科书,小学犹有教育的研究,中等国文则主义不定,搜罗甚富,而合于教育的独少,以其专知有文学也。”(6)国文教学“若徒事古代之文学的,恐于世界趋向之新理不合”(6),主张“先求其成为科学,须寻出系统。系统既得,仍宜以教育的教材配置之”(7)。言下之意,“文学”性质与教育、科学有别,国文教学不当徒重“文学”。

一些国民教育提倡者,亦将国文与“文学”分别看待。王宠惠在江苏教育会演讲指出,国文应面向全体国民,而今为少数人所独有。故“吾国只有文学,而无国文”,“优美文字是为文学,列科学之中,而国文则为人人所共有”(《江苏教育会议第三次讲演会详纪》6)。为普及国民教育,吴县陈懋治提出改初小学校国文科为国语科,以实现言文合一。他认为小学毕业生国文程度低下,要因在于中国文字简古,无割然分明之程序。应取当日通行官话编定为国语,并以此种国语编辑国文教科书。针对“改国文为国语,则中国古书能解者少,文学将绝”的质疑,他指出:“中国文学系美术的,非实用的;专门的,非普通的。故非专心致力十余年,必不能通。[……]况夫初等小学,固非为造就文学专家之地,有志文学专家,固当于专门以上学校求之。”他认为所谓“文学”当从广义而言,“国语亦文之一”,不必以典谟训诂始谓之文,白话小说亦可列于“文学”(陈懋治 第17版)。所说“文学”就文章而言,在国民教育理念下,把白话小说当作国语之文,置于“文学”之列。与此相呼应,陆基提议在国民学校施行此法。他认为“国语”是联合国民情谊的利器,而“国文”是文人学士所致力之国粹,“保存国粹,自有文学专科,不必人人同负此责任”(陆基 第17版)。这与陈懋治的国民教育理念相近,但“文学”的意涵范畴差别悬殊。

进入学校国文教学的“文学”，在不同理念的冲击下，地位动摇不定。滦县段洙编辑《中学文法要略》称：“此编第为中学说法，助之产生理想，俾成完全知识耳。若曰神明律吕，蔚为文学名家，则有高等专门之教。”（段洙 3）即便官方学制已确定中学国文课程的“文学”旨趣，但在实际教学中，仍有不少人将“文学”视为高等专门之业，认为非中学文法练习所宜。这是当时教育理念与“文学”观念多元性的结果。

三、《中国文学史》的争议

在以西学为框架的新式学校课程体系 中，“文学史”是小学以上国文科的规定内容。清末民初相继出现的国人自编《中国文学史》，普遍受到日本同类著作的影响，但并无固定程式，体例、内容的取择存在广泛的争议。学界先行研究已指出，源自欧洲的“文学史”（literary history）观念，在经日本引入中国的过程中，因受历史、教育制度、意识形态、中西文化等因素影响，《中国文学史》写作存在差异。^④从近代“文学”概念流变的进程来看，民国初年《中国文学史》写作的争议，正是分科教育初期“文学”观念纠葛的表现。

民初商务印书馆聘请人员编写《中国文学史》，在各级学校国文教学中占有一席之地。教育部所定中学章程规定，中学第四学年国文科除讲读、作文等外，兼授“中国文学史”，王梦曾《中国文学史》即遵此编纂。该书“准诸文学变迁之大势”，“编纂方法以文为主体，史学、小说、诗词、歌曲等为附庸。文字为文章之源，亦著其因革，其他经学、理学等只旁及焉”（王梦曾，《中国文学史》1）。该书以阐述文章演变为主，除应对学校教科需要外，还有在欧化潮流中保存中国固有“文学”的用意。该书编就后，王梦曾因原书限于篇幅，多引而不发，故编纂《中国文学史参考书》，依照原书章节，对书中所列作品详细援引成文。经教育部审定，称可作为中学校教科书及教员参考书（王梦曾，《中国文学史参考书》1）。张之纯编纂、蒋维乔校订的《中国文学史》，遵照部定师范学校课程标准，供本科师范生第三、四学年之用。该书以“经传为文学之正宗”，兼及与“文学”相关的训诂、性理、内府藏书，词章之中以韵文为多，对于近世日益发达的小说、戏曲，亦择要叙列

（张之纯 1—2）。在内容上，与王梦曾所取有较大差异。商务印书馆出版图书广告称：“凡历代文学之变迁、经传之流别、汉宋诸儒之学派及韵文、散文、小说、戏曲，无不详为叙述，洵文学家之南针也。”（《商务印书馆新出版图书》6）内容较为广泛。

正由于对“文学”概念的不同理解，坊间所编《中国文学史》内容取择存在极大差异。教育部欲将学校课程纳入统一的轨范，对王、张所编教科书的审定评价甚为悬殊。教育部批示称，王梦曾所编“简括得要，甚为合用”（《批商务印书馆中学〈中国文学史〉教科书及参考书各一册改正后一并送核》87）。张之纯所编，“以文学史立名，而枝条蔓衍，往往溢出范围”，“如学派异同胪列至十余节之多，殊非文学史上之要点”。“经学家之师承、学校之制度、教育之成才、科目之设置、书籍之存亡、楷书草书之体法等，皆似为中国学术史或文化史之材料。至算学、医学之类，尤与文学无涉。”（《批商务印书馆〈中国文学史〉上下册须大加删汰以合教科书体裁此书无从审定》73）内容过于庞杂，“须大加删汰以合教科书之体裁”，“无从审定”（74）。

《中国文学史》的出现，是 19 世纪以来欧洲的学科观念条理中学的产物，对于当时的国人是全新的事物，借鉴日本已有的《支那文学史》成为有效办法。王燦翻译古城贞吉《支那文学史》，以《支那四千年文学史》为题发表（王燦 1）。与古城贞吉原书对比，该文只是原书第一章，包括四节内容。全书于 1913 年翻译完成并出版。这些日本著作的翻译刊出，对当时的国文教育具有持续影响力。

1914 年秋，正在日本学习的曾毅，接到泰东图书局主人来信，嘱其编纂《中国文学史》，“俾择东籍善本译之”。曾毅收信后，感其创始之难，又不满于日本人所编，乃自编以应命（曾毅 2）。经研究指出，该书以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儿岛献吉郎在 1912 年出版的《支那文学史纲》为蓝本，而有所增删（陈广宏 628—653）。从文本对比来看，曾毅此书在章节结构、内容方面，都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儿岛献吉郎的书。^⑤曾书以历代诗文为主，兼及学术，如“中古文学”包含东汉训诂学；“近古文学”中有宋代道学，并涉及戏曲、小说。从曾毅所写《凡例》可看出他对“文学”的认

识：“文学之变迁升降，尝与其时代精神相表里。学术为文学之根柢，思想为文学之源泉，政治为文学之滋补品。本篇于此三者，皆力加阐发，使阅者得知盛衰变迁之所由。”（曾毅 1—2）泰东书局图书广告称，该书“杂探经传、史策、诸子百家之言，叙述文学上散文、骈文、诗词、歌赋、剧曲、小说及与有关系之经学、史学、理学、小学。凡一切源流派别变迁之远由，并各时代盛衰升降之特色，靡不钩深索隐，所绍旁搜”（《中国文学史》）。可见其内容之庞杂。

同时期，钱基厚编纂《中国文学史纲》。据称，该书为作者1914—1915年讲学时所辑，“内分‘正名’、‘原始’、‘考论’、‘谭史’、‘攻子’、‘考文’六节”。印行时，“考论”改为“阐经”，末尾增“完体”一节（陈玉堂 10—11）。其内容包纳经史子集，并不限于文辞一途。

由于编纂者旨趣、编纂方式的不同，此类书的体例、内容引发了极大的争议，谢无量的系列著作尤其具有代表性。就职中华书局期间，谢无量编著《中国六大文豪》《中国妇女文学史》《中国大文学史》三部著作。对于正处草创期的国文学科，如何编写体例、内容适用的专门之书实为难题。谢无量意识到“吾国文学甚难知”，旧有的专集、总集、文苑传、诗话文评各有所偏，不能得“文学”要领（谢无量，《中国六大文豪》1）。能代表“中国文学”者，不外屈原、司马相如、扬雄、李白、杜甫、韩愈六家。《中国六大文豪》即以此六家为纲，先论文章与时势之关系，次及作文岁月先后，并证以其行事，“文之精粹，颇加采掇，悉下诠注，并著后之评论，以见指归”，“由是以辨古今文学之源流”（4），欲融合文集、文苑传、诗话文评的特点于一编。他所说的“文学”即指文辞，《中国妇女文学史》亦专论闺阁文章（谢无量，《中国妇女文学史》2）。

当时学界对“文学”含义及“文学史”内容的争议，在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中有所体现。他列举中外学者对“文学”的定义，将当日受西学影响出现的“文学”一科，指为“施于文章著述之通称”，并上溯到《论语》中的“文学之科”，认为古今一贯。所列中国古代“文学”实为关于“文”的论说。他对“文”与“文学”的认识，受到章太炎与阮元、刘师培之间分歧的影响，并接受西方“文学”具有美、表情特质的观点。在综论各家学说

后，采用章太炎有句读文、无句读文的分类，归纳中国古今文章体制（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1—6）。《中国大文学史》在民国时期影响甚大，该书内容庞杂的特点引起了批评。1919年在北大读书的傅斯年，批评该书“并不是用文学史的做法去做的，也不是一部著作，不过是小文学史的长篇”，“但论材料，也不能使人满意。《淳化阁帖》里面荒唐无稽的上古书契，居然引据到‘字形之变迁’里来”。认为没有批评的价值，“想把原意扩充，不单评谢先生这部书，去做一篇《中国文学史的编制法》”（傅斯年 390）。傅斯年的批评，恰反映出以西学为准的学科范式创立过程中的艰难与曲折。中国的文章之学以文集、文苑传、诗话文评为载体，自有特点，与西来的“文学”“文学史”观念差别悬殊。自19世纪中期以来，中文世界的“文学”一词受中、西、日多元观念影响处于变化中，在民初虽较多地指向以文字表达“审美”“艺术”之义，但仍具有多元变化的特点。在近代学科体系草创期，当国人面对全新的西式学科形态时，由于知识眼光的差异，看法难免歧异。

民国初年初等学校教育“文学”观念纠葛的历史，给中国教育与文学留下了无尽的思考。近代分科的学术观念，以西学为基准演化而来，不仅改变了近代以来的知识形态，而且深刻地影响了世人对中国传统学术的认识。当前构建中国特色的学术知识体系，需对传统文化进行更多的探索，求其本真，避免简单地以外来观念附会之。而近代以来的学校教育，改变了中国旧有的文教体系，不仅是学术传承的主要媒介，而且关系着民族精神、审美趣味等文化品格的养成。初等学校教育应明确教育的目的和意义，立定方向，国文教学面向大众的同时不失高雅，以锻造多元文化品质。凡此种种，尤须突破近代以来的学科畛域，以贯通的眼光上下求索。

注释[Notes]

① 学界先进对近代“文学”概念的研究，存在以后来形成的对译“literature”或专指辞章之学的固定用法，回溯其历史之嫌。笔者前期研究对19世纪“文学”的含义作了具体辨析，与前人有所不同，提请读者注意。见桑兵、关晓红主编：《分科的学史与历史》，“第一章 近代中国‘文学’源流（1819—1876）”。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65—95。李敏：《从书报传播到学堂立科：1896至

1898年间“文学”概念的流播》，《广东社会科学》5(2020): 121—131。李敏：《清末学制改革与“中国文学”的演生》，《史学月刊》9(2021): 49—57。

② 文、史学界代表性研究主要有：陈平原：《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栗永清：《知识生产与学科规训：晚清以来的中国文学学科史探微》。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余来明：《“文学”概念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陈广宏：《近代中国文学概念转换的历史语境与路径》，《文学评论》5(2016): 84—98。桑兵、关晓红主编：《分科的学史与历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罗志田：《近代“道出于二”语境下学科认同的困惑》，《天津社会科学》1(2015): 175—183。

③ 近代日本的“文学”概念，可参阅铃木贞美：《文学的概念》，王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

④ 参见戴燕：《文学史的权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⑤ 参见儿岛献吉郎：《支那文学史纲》。东京：富山房，1912年。

引用作品 [Works Cited]

- 《中国文学史》，《新中华》1.4(1916)。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The New China Magazine* 1.4(1916): blind page.]
 《约翰大学毕业式志盛》，《申报》1914年6月28日第10版。
 [“An Account of the Grand St. John’s College Graduation Ceremony.” *Shun Pao* 28 June 1914.]
 《各校应用之书》，《申报》1915年9月2日第4版。
 [“Books for All Schools.” *Shun Pao* 2 September 1915.]
 《商务印书馆出版图书》，《图书汇报》27(1913): 1—91。
 [“Books Published by the Commercial Press.” *The Book Report* 27(1913): 1—91.]
 蔡元培：《对于新教育之意见》，《蔡元培全集》第2卷，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9—16。
 [Cai, Yuanpei. “Opinions on New Education.” *Complete Works of Cai Yuanpei*. Vol. 2. Ed. The Chinese Research Society of Cai Yuanpei. Hangzhou: Zhejiang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1997. 9—16.]
 陈广宏：《曾毅〈中国文学史〉与儿岛献吉郎〈支那文学史纲〉之比较研究》，《罗宗强先生八十寿辰纪念文集》，卢盛江、张毅、左东岭编。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628—653。
 [Chen, Guanghong. “A Comparative Study of Zeng Yi’s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Kojima Kenkichirō’s Outline of the History of Sina Literature.” *A Collection of Commemorative Writings on the 80th Birthday of Mr. Luo Zongqiang*. Eds. Lu Shengjiang, et al.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9. 628—653.]
 陈懋治：《初小改设国语科意见书》，《申报》1916年8月18日第17版。
 [Chen, Maozhi. “Proposal for Establishing a Mandarin Section in Elementary Schools.” *Shun Pao* 18 August 1916.]
 陈玉堂：《中国文学史书目提要》。合肥：黄山书社，1986年。
 [Chen, Yutang. *Bibliography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Hefei: Huangshan Publishing House, 1986.]
 丁年甲：《论现在学校国文教授之缺点及其补救方法》，《国学杂志》6(1916): 1—9。
 [Ding, Nianjia. “On the Shortcomings of Chinese Teaching in Present Schools and Their Remedies.” *Sinology Magazine* 6(1916): 1—9.]
 段洙编：《中学文法要略》，《都市教育》14(1916): 3—6。
 [Duan, Zhu, ed. “Essentials of Middle School Grammar.” *Urban Education* 14(1916): 3—6.]
 《编辑大意》，《文艺杂志》3(1914): 2。
 [“Editor’s General Idea.” *Literary Magazine* 3(1914): 2.]
 范源廉：《论教育当注重训练》，《中华教育界》4.1(1915): 1—8。
 [Fan, Yuanlian. “On the Importance of Practice in Education.” *Chinese Educational* 4.1(1915): 1—8.]
 凤兮：《今后国民教育之研究》，《大中华》1.7(1915): 1—8。
 [Feng, Xi. “Research on Future National Education.” *Great China* 1.7(1915): 1—8.]
 傅斯年：《傅斯年启事》，《新潮》1.3(1919): 390。
 [Fu, Ssu-nien. “Fu Ssu-nien’s Notice.” *The Renaissance* 1.3(1919): 390.]
 华慧纬：《论游历有益于文学》，《妇女杂志》1.1(1915): 9。
 [Hua, Huiwei. “Travel Is Good for Literature.” *Women’s Magazine* 1.1(1915): 9.]
 《教育部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及课程标准(呈正副总统咨各省都督)》，《临时政府公报》4(1912): 2—8。
 [“Interim Measures and Curriculum Standards for General Education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Presented to the Vice President and Governors of all Provinces).” *Provisional Government Bulletin* 4(1912): 2—8.]
 《教育部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及课程标准(续第四期)》，《临时政府公报》5(1912): 10—14。
 [“Interim Measures and Curriculum Standards for General

- Education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Continuation of No. 4).” *Provisional Government Bulletin* 5(1912): 10-14.]
- 《批商务印书馆〈中国文学史〉上下册须大加删汰以合教科书体裁此书无从审定》,《教育公报》3.5(1916): 73—74。
- [“Instructions on the Deletion and Revision of the First and Second Volumes of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Edited by the Commercial Press to Conform to the Textbook Genre, and the Book Is Not Approved.” *Education Bulletin* 3.5(1916): 73-74.]
- 《批商务印书馆中学〈中国文学史〉教科书及参考书各一册改正后一并送核》,《教育公报》8(1915): 87。
- [“Instructions on the Textbook of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Its Reference Book Edited by the Commercial Press for Middle Schools to Be Sent for Approval after Revision.” *Education Bulletin* 8(1915): 87.]
- 寄鸥:《论文学家非教育家》,《湖北教育杂志》1.3(1912): 5—13。
- [Ji, Ou. “On Literary Man Not Being Educator.” *Hubei Education Journal* 1.3(1912): 5-13.]
- 蒋维乔:《从南京教育部说到北京教育部》,《教育杂志》27.4(1937): 1—11。
- [Jiang, Weiqiao. “From Nanjing Ministry of Education to Beijing Ministry of Education.” *Education Magazine* 27.4(1937): 1-11.]
- :《教授法讲义》。上海:商务印书馆,1913年。
- [——. *Notes of Pedagogies*.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 1913.]
- 黑田茂次郎 土馆长言编:《日本明治学制沿革史》“第三章中等教育”,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08年。
- [Kuroda Shigejirō, and Tsuchidate Chōgon, eds. “Chapter III Secondary Education.” *History of Meiji School System in Japan*. Trans. The Commercial Press.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 1908.]
- 雷瑛:《新编国文读本序》,《文艺杂志》3(1914)。
- [Lei, Jian. “Preface to the New Chinese Reader.” *Literary Magazine* 3(1914).]
- 吕达主编:《陆费逵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
- [Lü, Da, ed. *Selected Works on Education by Lu Bikui*. Beijing: People’s Education Press, 2000.]
- 陆基:《改国民学校国文为国语科议》,《申报》1916年8月19日第17版。
- [Lu, Ji. “Discussion on Changing Chinese Liberal Arts into Mandarin Subject in National Schools.” *Shun Pao* 19 August 1916.]
- 缪文功:《国文教科书之批评及其改良方法》,《中华教育界》4.6(1915): 1—7。
- [Miao, Wengong. “A Critique and Suggestion for Improvement of Chinese Textbooks.” *Chinese Educational World* 4.6(1915): 1-7.]
- 《商务印书馆新出版图书》,《图书汇报》58(1916): 1—13。
- [“New Books Published by the Commercial Press.” *The Book Report* 58(1916): 1-13.]
- 潘襄成:《论国文衰落之影响及其挽救之方法》,《东吴》1.2(1914): 18—21。
- [Pan, Xiangcheng. “On the Influence of the Decline of Chinese Subject and Its Remedy.” *Dongwu* 1.2(1914): 18-21.]
- 祁焯煥:《中等教育国文科自动之教授法》,《京师教育报》32(1916): 35—38。
- [Qi, Yaohuan. “Automatic Teaching Method of Chinese Subject in Secondary Education.” *Peking Educational Review* 32(1916): 35-38.]
- 璩鑫圭 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
- [Qu, Xingui, and Tang Liangyan, eds. *Collected Materials of Modern Chinese Educational History: Evolution of the School System*. Shanghai: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1991.]
- 膏厂:《中国教育上固有之特色及今后教育之要点》,《中华教育界》16(1914): 1—7。
- [Se, An. “The Inh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Education and the Key Points of Future Education.” *Chinese Educational World* 16(1914): 1-7.]
- 沈昌直:《中等学校国文教授私议》,《中华教育界》4.9(1915): 1—7。
- [Shen, Changzhi. “Private Discussion of Chinese Teaching in Secondary Schools.” *Chinese Educational World* 4.9(1915): 1-7.]
- 《顾平之编述国文讲义宣言》,《天铎报》1912年9月6日第6版。
- [“The Declaration of Chinese Notes Compiled by Gu Pingzhi.” *Tianduo Pao* 6 September 1912.]
- 《民国纪元商务印书馆发行所落成纪念 新编共和国教科书五折收价》,《天铎报》1912年4月14日第2版。
-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Commercial Press Issuing Office in the Founding Year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50% off for the New Republic Textbook.” *Tianduo*

- Pao 14 April 1912.]
- 《江苏教育会议第三次讲演会详纪》，《申报》1915年9月4日第6版。
- [“The Third Lecture of Jiangsu Educational Conference.” *Shun Pao* 4 September 1915.]
- 王燦：《支那四千年文学史》，《说报》2(1913)：1—11。
- Wang, Can. “A History of Four-Thousand-Year Sina Literature.” *The Tang Pao* 2(1913)：1—11.]
- 王梦曾编纂：《中国文学史》，蒋维乔校订。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
- [Wang, Mengzeng, ed.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Ed. Jiang Weiqiao.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 1923.]
- ：《中国文学史参考书》，蒋维乔、许国英校订。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年。
- [---. *A Reference Book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Eds. Jiang Weiqiao and Xu Guoying.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 1925.]
- 王朝阳：《说卑劣文学之害》，《教育研究》15(1914)：1—4。
- [Wang, Zhaoyang. “On the Harm of Despicable Literature.” *Education Research* 15(1914)：1—4.]
- 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上海：中华书局，1940年。
- [Xie, Wuliang. *A Great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Shanghai: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40.]
- ：《中国妇女文学史》。上海：中华书局，1931年。
- [---. *A History of Chinese Women's Literature*. Shanghai: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31.]
- ：《中国六大文豪》，《大中华》2.3(1916)：1—12。
- [---. “Six Literary Giants in China.” *Great China* 2.3 (1916)：1—12.]
- 杨昌济：《余归国后对于教育之所感》，《杨昌济集》第1册，王兴国编注。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50—64。
- [Yang, Changji. “My Thoughts on Chinese Education after Returning to China.” *Collected Works of Yang Changji*. Vol. 1. Ed. Wang Xingguo. Changsha: Hunan Education Press, 2008. 50—64.]
- 姚鹓雏：《文学论卮言》，《姚鹓雏文集（杂著卷）》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644—645。
- [Yao, Yuanchu. “A Random Talk on Literature.” *Collected Works of Yao Yuanchu (Volume of Miscellaneous Works)*. Vol. 2. Shanghai: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12. 644—645.]
- 余箴：《美育论》，《教育杂志》5.6(1913)：71—79。
- [Yu, Zhen. “On Aesthetic Education.” *Education Magazine* 5.6(1913)：71—79.]
- 袁希洛：《日本各种教育之系统》，《江苏教育行政月报》4(1913)：1—10。
- [Yuan, Xiluo. “The Various Educational Systems in Japan.” *Jiangsu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Monthly* 4(1913)：1—10.]
- 曾毅：《中国文学史》。上海：泰东图书局，1918年。
- [Zeng, Yi.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Shanghai: Taidong Press, 1918.]
- 张之纯编纂：《编辑大意》，《中国文学史》卷上，蒋维乔校订。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年。1—2。
- [Zhang, Zhichun, ed. “Editor's General Idea.”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Vol. 1. Ed. Jiang Weiqiao.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 1924. 1—2.]
- 张直生：《论吾晋小学之通病》，《教育杂志》1.1(1914)，山西省教育会编：1—3。
- [Zhang, Zhisheng. “On the Common Faults of Primary Schools in Shanxi Province.” *Education Magazine* 1.1 (1914), ed. Shanxi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1—3.]
- 张佐汉：《文学教授细目例言》，《直隶教育界》2(1913)：31—34。
- [Zhang, Zuohan. “Introduction to Detailed Entries of Literary Teaching.” *Zhili Educational Circles* 2(1913)：31—34.]

(责任编辑：程华平)